

七日談

(澳門篇)

首次去寧波，參加長三角大灣區文學周暨寧波第十三屆文學周活動。

對於寧波的印象，來自歷史教科書上的《南京條約》。當年要應付考試，一個不落地記下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港口。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距今一百多年。但寧波的歷史，不以百年論。到了寧波，一下子穿越到七八千年前中華文明起源處。

會務組帶領我們半天內奔馳三個同在浙江餘姚的參觀點：井頭山遺址、河姆渡遺址及姚江學派創始人王陽明的故居。同行中有人自嘲，到了寧波，才知道自己沒文化。對我深有同感。

讀書開悟，躬身踐行。我在江南春雨裏走走、邊看、邊聽，調動了自己所有知識和經驗，更覺陸游詩句的深刻：「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陸游早有體悟，並將經驗傳給後代，寫成此《冬夜讀書示子聿》詩。「知行合一」正是明代王陽明心學的核心要素。浙江餘姚，王陽明的人生由此出發，走進中國歷史，成為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書法家、軍事家，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此心光明，亦復何求」八個字，每每讀之，為心拂塵。

起源於八千三百年前的井頭山遺址與河姆渡遺址距離不遠，是中國人最早走向海洋的見證，它比河姆渡的稻作文明早了一千多年。但若以名氣論，河姆渡要更勝一籌，因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它已正式載入內地歷史教科書（我已不記得自己唸書那會兒歷史課本上有沒有這

段），證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改變了「中原」一元論的認知。

微風細雨撲面。當知識不再僅限於紙上文字，而是呈現在眼前的鮮活現場，一切便真真切切起來。那風、那雨，是否八千年前也曾這樣吹拂和飄灑？井頭山遺址為我們填補中國遠古與海洋關係的認知空白，是了解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海洋生活的現場課堂。儘管澳門是一個與海洋有深厚淵源的城市，但對於海洋，人類從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航海大發現才知道了海洋有多大，這一發現結果和澳門有直接關聯。一直到二十世紀，我們才知道海洋有多深。到了二十世紀末，人類開始了進軍深海的探尋之路。

參觀井頭山遺址，我又學習到一個新詞——「貝丘遺址」，指古代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形態，即眼前所見由貝殼堆成的小山丘。專業詮釋則是地層裏大量堆積的古代人類吃剩下的貝殼。這裏是中國最早期的貝丘遺址。這些堆積的貝殼被生動地形容為古代的「廚餘垃圾」。八千年滄海桑田，讓一切發生變化，但不變的是這一帶人的飲食習慣，今天的寧波人依然吃着和八千年前一樣的小海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人類的生存本能；把吃變成美食，則是智慧。

考古的盡頭是抽絲剝繭後的故事。很多考古沒有盡頭，人間故事便永遠講不完。井頭山遺址是河姆渡文化的直系祖源，即井頭山人是河姆渡人的祖輩，但中間尚隔着八百到一千年的缺環待考。

河姆渡遺址，從七千四百多年前成為陸

地，先民選擇於此定居，種水稻、建房屋。至今，河姆渡遺址形成了四個「文化層」。所謂文化層，就是生產生活遺留下來的器具、垃圾等，日積月累淤於土中形成堆積。七千年來，這裏一次又一次被洪水淹沒，待洪水退後，一批又一批的人重新聚居於此，也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因子。

面對遺址，我們感興趣的依然是最能體現當年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河姆渡先民用陶釜煮米飯或羹魚。那帶有「腰線」的陶釜，不但在造型上更有線條感，據說「腰線」的實際作用類似我們使用電飯煲用來計量的刻度；還有遺址上的金槍魚骨、木槳、建築用的榫卯木構件等，為河姆渡文化提供了海洋文明的佐證。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牆上，看到《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述：「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無鐵錘之患。」無疑，飯稻羹魚是以水稻和漁產為主的江南水鄉傳統的飲食方式。羹，是用肉、或魚、或菜調和的湯食。想到近期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年》裏，常見吳越國人食物為湯食，大概就是飯稻羹魚中的「羹」吧。這劇拍的考究，當鏡頭移到中原，趙匡胤父子吃的則是麵條了。

數年前看過同樣位於浙江的良渚遺址，距今約四到五千年，玉器製作工藝已趨成熟。而此次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中，看到了更早期的玉器，璜為掛件，玦為耳環。當時河姆渡已有慶祝豐收的篝火晚會，男人頭插羽毛，腰繫獸皮，女人們耳戴玉珠，胸佩掛飾，踏歌起舞。從古至今，人類對於美的追求與肯定、對於美好

生活的嚮往，從未改變。

參觀結束，用過午餐，會務組就地舉行陽明心學與嶺南哲學主題沙龍，參與行程者結合自身創作進行發言，體現寧波人是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踐行者。

自己並沒有深入研讀過陽明心學，略知王陽明心學著作《傳習錄》，養分傳承自儒家思想。著作名直接來源於《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和習的邏輯關係，是強調將傳授、傳承的知識用於實踐。「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心學核心，是為文、更是為人要恪守的規範準則。從本心出發，說真話、向光明。心，不為外物所累；筆，不為世俗羈絆。心學是快樂之學，以得大快活自在為目標。

這大概是為何近年流行陽明心學，現代人太需要修心了。

「依舊青天此明月」。



▲浙江寧波井頭山遺址文物庫房內展示的第一期發掘出土的陶片。

青磚黛瓦承古韻，英歌煙火入鄉愁(上)

——榕江潮韻裏的千年文脈與豪邁風骨



繽紛華夏 陳文洲

揭陽的風，裹挾着南粵的溫潤與潮韻，掠過榕江的千年清波，拂過古城的斑駁黛瓦，也喚醒了普寧街巷深處的煙火豪情。一場漫遊，從揭陽古城的靜美時光啟程，再奔赴普寧，看英歌震動天地，品美食製帖人心，一路行來，皆是潮汕大地最動人的風物與深情。

揭陽古城：慢鏡頭裏的時光雋永

踏入揭陽古城，彷彿跌入一幅緩緩展開的水墨長卷。南宋紹興十年始建的城垣，歷經千年風雨洗禮，早已褪去初時的凌厲，只剩磚石縫隙間沉澱的溫柔與厚重。榕江南北兩河繞城而過，水色清碧，映岸古榕垂絲、騎樓錯落，將整座城暈染成一筆淡墨寫意的嶺南畫卷。

清晨的陽光穿透枝葉，灑在青石板路上，細碎光斑隨微風輕輕搖曳，恰似歲月在耳邊低聲絮語。古城的魂魄，深藏在揭陽學宮的紅牆黛瓦之間。作為全國第二大府縣縣孔廟，這裏紅牆映日、飛檐入雲，每一塊磚石都浸透了濃郁的書卷氣。庭院深深，古柏蒼蒼，恍惚間彷彿聽見千年琅琅書聲，看見古代文人揖讓行禮的身影。「海濱鄒魯」的美譽，絕非虛言，而是刻在古城骨血裏的文化基因，在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間靜靜流淌。

穿行於打銅街、中山路的騎樓群，南洋風情與潮汕韻味在此交織相融。斑駁牆面留着歲月痕跡，雕花窗櫺藏着往昔精緻，廊下陰影裏，依稀可聞舊時商賈的吆喝與匠人揮錘的回響。如今的騎樓，依舊商舖櫛比，老茶鋪氤氳着單叢的清香，小吃攤升騰着熱騰騰的煙火氣。老者閑坐門口，蒲扇輕搖，閒話家



▲揭陽古城彷彿一幅緩緩展開的水墨長卷。

作者供圖

常，軟糯語調裏藏着歲月從容。整座古城沒有喧囂人潮，唯有悠然煙火，只需緩步靜賞，便能讀懂揭陽的溫柔與厚重。

普寧英歌：濃墨重彩的生命禮讚

若說揭陽古城是溫婉水墨，那普寧英歌便是濃墨重彩的油畫，是潮汕大地極為磅礴的生命禮讚。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普寧英歌舞在央視春晚綻彩，普寧英歌歷經三百餘年傳承，融舞蹈、南拳、戲曲於一體，素有「中華戰舞」之美譽。

恰逢民俗盛會，於廣場邂逅一場英歌表演，瞬間被那排山倒海的氣勢震撼。舞者皆是精壯男子，臉譜繪就梁山好漢黑紅英姿，氣勢凜然；或持短槌，或握蛇矛，身着勁裝，步伐鏗鏘。鼓聲驟起，槌聲齊落，整齊劃一的動作剛勁有力，騰挪跳躍間盡顯陽剛之美。前棚舞者揮槌生風，節奏如驟雨打芭蕉；後棚鑼鼓噴噴鳴齊，樂聲激昂，響徹雲霄。

他們演繹着水滸英雄的忠義豪情，每一步都踏在人心之上，每一聲吶喊震撼天地。無華麗舞台，無精緻道具，唯有極為質樸的表演，傳遞着揚正壓邪、吉祥平安的祈願。這是力量之美，是民俗之魂，更是潮汕人刻在骨子裏的剛健豪邁，在鑼鼓喧天中，綻放出極耀眼的嶺南風華。



英倫漫話 江恒

巴斯作為英國的著名旅遊城市之一，向來以奧斯汀的故居作為賣點，她曾在此住過五年時光，當地的風土人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借筆下人物之口讚譽這座溫泉名城，「誰會對巴斯感到厭惡呢？」這也讓很多讀者形成一種印象，奧斯汀與巴斯關係密不可分，她喜愛並享受在這裏的生活。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去年底恰逢奧斯汀誕辰二百五十周年，在巴斯舉辦的一場展覽顯示，她在這裏生活得並不快樂，甚至認為這世界上最令人厭煩的地方。據說，當初奧斯汀住在漢普郡的時候，擁有安靜的環境、親密的社交圈以及創作自由，已非常習慣那裏的鄉村生活，可突然間遷至巴斯這樣一個繁華、社交密集的城市，讓她感到束縛與不適。與如今巴斯是一座美麗而歷史悠久的城鎮不同，在奧斯汀的時代，主城区到處在蓋房子，每家每戶都有冒着煙的煙囪，而且缺乏完善的水道系統。至少在有些地方，它並不是一個宜居之地。奧斯汀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透露，自己對巴斯的第一印象是「一片霧氣、陰影、煙霧和混亂」。

除了環境因素外，巴斯作為當時上流社會的度假勝地，以奢華的浴場、舞會和社交活動聞名，但這種講究排場、重視階級與外在形象的生活方式，令崇尚真誠與內省的奧斯汀感到厭倦。她在書信中曾諷刺地稱巴斯的社交為「無意

義的喧鬧」。另外，一八〇五年，奧斯汀的父親染上熱病去世，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令她心碎不已，心靈上受到不小的打擊，家庭的經濟狀況也隨之日益拮据，不得不依賴兄弟接濟。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加深了她的不安與失落感。

或許正是在巴斯的精神壓抑，讓奧斯汀在此期間幾乎沒怎麼寫作，唯一動筆的是小說《沃森一家》，但也只是寫了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直到奧斯汀隨家人搬離巴斯後，她才又開始創作，她在一八〇八年寫的一封信中曾描述自己「逃離的喜悅之情」。在她的小說《諾桑覺寺》中，主人公莫蘭和蒂爾尼有一段對話，「我承認，巴斯在六周內還算宜人；但超過六周，它就是世界上最令人厭煩的地方。」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她的內心世界。

雖然奧斯汀不太喜歡巴斯，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沒有從中汲取靈感。巴斯對奧斯汀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早在她全家搬來之前，她曾到訪過巴斯探風，在居住期間，她仔細觀察和吸收這座城市的一切，並將之融入她的故事中。比如，在她的兩部小說《勸導》和《諾桑覺寺》中，就大量運用了巴斯作為背景，如皇家新月樓、圓形廣場和泵房，以及專門的「The Jane Austen Centre」，吸引着無數書迷「朝聖」，折射出她與這座城市之間又愛又恨的錯綜複雜關係。

實際上，在文學世界中，有不少作家與他們成名之地或代表作背景之間也有着類似的矛盾情感。例如英國女作家

伍爾芙，她對於出生地倫敦同樣是既愛又恨。一八九八年她在寫給表親的信中，形容對倫敦的愛永不會冷卻，「每天都在數着日子，盼望着可以回到心愛的倫敦城。」她在一九一六年評論一本關於倫敦的書時寫道，「我們會願意讀這樣一本書，它關於這個城市的每條街道，讓你讀完還想讀。從已經滅絕了的怪物的骨骼到地窖裏印着羅馬皇帝像的硬幣，還有家門口小店主的名字，所有這一切都令人痴迷，生活的素材無窮無盡。」

另一方面，伍爾芙在為倫敦的自由感到欣悅的同時，也對它的種種局限保持批判的態度。例如，她在處女作《遠航》的開篇，描寫了夜間在倫敦苟活的赤貧賤民；在《三枚金幣》中寫到，是那些有影響力的男性統治着倫敦最有特權的空間。在《雅各的房間》和《歲月》中，揭露了倫敦社會觸目驚心的不公和不平等。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也是如此，在《都柏林人》中將都柏林描繪得細膩入微，但他成年後長期流亡歐洲，自稱「自願放逐」。他曾說：「我必須離開愛爾蘭，才能真正寫出它。」他對都柏林既熱愛又批判，情感極其矛盾。

從奧斯汀對巴斯的複雜感情不難看出，作家與地理空間的連結，未必是浪漫的歸屬，而可能是創傷、妥協或反思的產物。正因她對巴斯的不滿，反而促使她在《勸導》中深刻描寫一位成熟女性如何在失落中尋回自我，這或許正是文學的力量：從不快樂的現實中提煉出永恆的真實。

畫中園林滿目春



黛西札記 李夢

不入園林，怎知春色清麗如許。暖春時節，知名畫家張淳個展「我們走進文徵明的園子」在無錫開幕，讓我們在當代藝術展廳中，與近五百

年前的文人雅趣邂逅。展覽的緣起，是藝術家對於中國傳統文人精神的長久凝望。文徵明，明代「吳門四家」領袖，以詩文書畫與造園之藝，將古時文人的情懷與審美鋪展於《拙政園圖冊》和《東園圖》等傳世之作中。文徵明畫中的亭台掩映、曲水回廊與玲瓏湖石，不只是具象的景致，亦指向古代文人「會心不遠」的精神原鄉。張淳是次個展以「走進文徵明的園子」為題，以當代藝術創作的視角與姿態輕叩古園之門，開啟一場穿越時空的心靈之旅。自二〇二四年夏在北京「798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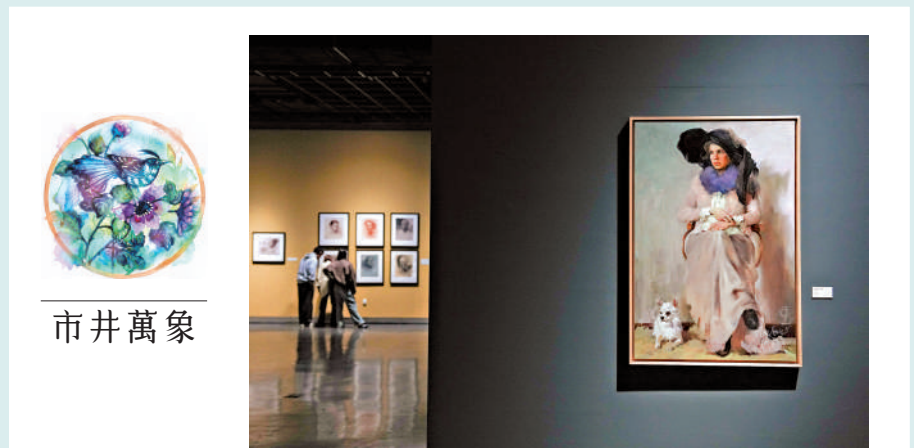
區」首展以來，展覽已走過北京、無錫，其中部分展品亦常展出於羅馬和那不勒斯等歐洲城市的藝術展覽。不論南北習俗與中外文化背景如何差異，不同城市的觀者在這些油畫和水彩作品前，總會收穫相似的共鳴。古時園林並不遙遠，而是可觸可感、充滿生機。畫家帶引觀者在園林亭台樓閣間遊走，細賞草木，優哉游哉，閒適爛漫。外國觀者從中讀到中國人對自然、對寧靜致遠的嚮往；中國觀者則在此尋回了傳統文化的溫度。

張淳筆下的園林，遠非復刻古畫，而是以當下語彙再思古典之美。他不再沿用傳統文人畫園林的淡墨簡筆，轉而運用西方油畫、水彩的豐富色彩與肌理，重構園林的空間與意境。畫中園林在色塊與筆觸的往來互動中若隱若現，湖石與花木在光影與色彩的變幻中，充滿生命的律動和想像。東方美學的含蓄與西方藝術色彩及情緒的張力，在畫中互為映照。觀眾彷彿真的走進了



▲張淳油畫作品《我們走進文徵明的園子之二》。

一座文人園林，既能望見古人的閒雅，也不乏當代性與實驗性的探索。近五百年前，明代畫家文徵明繪《拙政園圖》，畫的是園林，寫的是心境，是身處塵囂卻心向澄明的嚮往。五百年後，張淳帶引我們重訪此園，發覺優雅綿延，從未遠去。這份優雅與生機，藏在曲徑，藏在花木扶疏，也藏在古今中外相通的情感中。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們對安寧、美和詩意生活的嚮往，始終如一。



中俄師生作品亮相「涅瓦目光」

四月二十一日，中國美術學院與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攜手推出的「涅瓦目光——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師生作品展」在浙江美術館展出。

新華社